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編號：NSC 89-2411-H-002-099

執行期限：89年8月1日至91年7月31日

主持人：陳芳妹 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一、中英文摘要

當西元前十四-十一世紀，黃河流域，以青銅為主要藝術質材以鑄造青銅禮容器的傳統，正以安陽為中心，發展其強勢的青銅文明，北達遼寧，東抵山東，西南及於四川，西北達到鄂爾多斯高原，南方到廣東皆可發現青銅容器。在長江流域上游的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正發展出獨特的主體青銅藝術，以人像、神像、動物立雕、大型銅樹、祭壇為主，而只留下較小的部分的青銅容器等與大主流區可能有間接所關聯。三星堆青銅文明，以其獨特於大主流青銅文明，而在上古青銅藝術史中，有其鮮明、不可取代的地位。三星堆青銅藝術作為「區域研究」的個案，分析其獨特性，並試圖了解其別於大主流趨勢自力發展所形成的基礎，及其開放空間中所形成的交流的多向或單向所呈現的發展與限度。本研究試圖將三星堆青銅藝術會觀金沙青銅器一齊放在殷商大主流及長江流域的青銅工藝的發展脈絡中，並平行比較其它青銅工藝古文明，如埃及、兩河流域及希臘，以勾勒出三星堆青銅藝術的歷史意義。

關鍵詞：三星堆、區域風格

San-hsing-tui Bronze Culture, Regional Style

The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role of the bronze art from San-hsing-tui excavation – a case study of the regional style of bronze art.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4th.c. to 11th.c. B.C., the art ritual bronze vessels had been developed as the main stream spreading over the areas north to Laoning, eastern to Shantung, southeastern to Suichuan, northwestern to Ordos region. Besides a low proportion of bronze vessels were casted, the bronze art at San-hsing-tui were mainly casted as human or god sculptures, bronze trees with bird sculptures and other animal sculptures, etc.

It is so unique to the main stream of the bronze art centered at the metropolitan Anyang, that San-hsing-tui bronze art had its significant historical role. As a case study, the unique of San-hsing-tui bronze art will be analyzed its foundation and formation of the regional style and the degree it opened to the main stream to influence or be influenced visa versa.

Keyword : San-hsing-tui, regional style

二、計劃緣由與目的

1. 緣由

三星堆二個器物坑的完整報告的公佈及成都金沙遺址的文的大量出土，及較詳盡報告的問世，皆使得三星堆青銅藝術的歷史意義須要重新評估。

2. 目的

以比較的觀點把三星堆青銅藝術由近

及遠，與安陽、長江流域、兩河流域、埃及、希臘青銅藝術作個銅概念成形技術、藝術家形象等的風格比對，試圖從三星堆「區域風格」的個案研究尋找三星堆青銅藝術的歷史意義。

三、結果與討論

把三星堆青銅藝術放入區域的及週邊的考古情境中討論，本研究試圖分析區域的物質文化是否對質材有特有的價值觀，探討不同質材間的競爭關係、以及透過區域比較，解析城市文明間的競爭與相互流通，以詮釋青銅藝術品，本研究展開下述新議題及新觀點：

1. 把三星堆青銅藝術放入城市文明的框架中加以理解：

三星堆青銅器所出土的二個器物坑位於東、西、南三方的城牆之間，從其數量而言，代表了在城牆內已經形成了規模相當大的青銅器的使用中心(或需求中心，或消費中心)。它不只代表此城市須要具備有掌握此稀有資源的能力，更須要有使質材成形的背後概念、質材所透漏的區域對質材的價值觀、及成形的的方法以成就其視覺形象。

2. 古代青銅藝術？絡中的三星堆 — 三星堆的銅立人像、銅箔飾及銅尊：

所謂青銅藝術實包括成形技術、用銅概念及藝術形象。三星堆的青銅藝術必須放在古代青銅藝術？絡中理解，特別是藝術形象所反映用銅概念及成形技術二者間的有機組合所形成的特質，在透過不同層次的比較才能突顯出來。如三星堆的銅立人像等，其用銅概念必須與黃河流域的中原的以銅容器，為主要用銅概念的傳統相比較，其獨特性才能呈現出來，高 260.8 公分的三星堆銅立人像，就以銅所形塑的人體為藍本的大型藝術形像而言，其背後所代表的用銅概念在 2300B.C.第六王朝的古埃及已見得，但成形的技術則大不同。埃及的 Pepi 國王像的成

形技術則是內有木頭為內模，敲擊紅銅(或有少量的錫)而成。三星堆的銅立人像卻是採用分段的塊範法，而後將每段接合成形而成。

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並不是不知道敲擊銅成片狀的技法，98 件銅箔飾在 2 號器物坑出現，是值得給予關注的。三星堆 98 件銅箔飾，均捶打而成，厚度為 0.1-0.2 毫米，長度則多在 10 公分以內，有些且鑿鑿紋飾，有的甚至繪黑彩。這種把銅捶打成形的技術，在西元前 12、13 世紀的黃河、長江兩流域的青銅文明中雖是罕見的，但卻為三星堆青銅工藝的藝匠所知悉，但是，在為高 260.8 公分的銅立像成形時，卻採用了與銅容器如銅尊等相近的技法，顯然這些藝匠精於塊範法，並在成形巨體時作了選擇。

這是中原早以發展出來的成形青銅容器的方法。其成為中原用銅概念中成型的主要類別，而為三星堆成形的藝匠所利用，並以此方法成形出中原看不見的高大青銅人形巨像，這種以塊範法成形高大人體青銅巨像，在世界其它青銅古文明中是罕見的，是三星堆在古代青銅工藝文明中的獨特處。

3.三星堆的銅瑗與玉璧 — 用銅概念、質材角色競爭及價值觀：

三星堆的用銅概念，除了成形中原所罕見的人像或神像外，更用以鑄造中原所罕見的銅瑗，而在二個器物坑與中原所常見的玉璧共現，這類圓形的瑗在中原主要是以玉質出現的，這些圓形玉器主要源自裝飾，在良渚文化發展出以量而不以紋飾及質材的精工為尚的價值觀。在三星堆有極大的石璧，並有大小不等的為學者所稱的「列璧」，其類以形制在三星堆，且以銅質呈現，而量方面則大量地超越玉璧，如 1 號器物坑銅瑗 74 件，以對比玉圓形器，如報告所稱的玉環 1 件，戚形璧 3 件、玉瑗 2 件、戚形佩 1 件、2 號器物坑則銅瑗 58 件，以對比玉圓形器 10 件，如報告者所稱的玉璧 2 件、玉環 1 件、玉瑗 7 件。這種大量銅瑗的出現在星堆

是意味著三星堆文化在進入青銅時代以後，對青銅的應用及與玉器類型的重疊與中原發展出來的裝飾功能由玉扮演，容器功能由青銅扮演的定制大異其趣。

4.金沙文物提供了理解三星堆青銅藝術的新角度：

時代斷為商後期到西周早期的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的青銅人立雕，青銅瑗(有些且有精美紋飾)以及其它相關文物等，說明三星堆青銅藝術及器物藝術在地區及時間上，不是孤島，而是有其時空輻射區。

5.三星堆青銅藝術與長江流域及黃河流域的競爭與相互流通：

對長江流域而言，三星堆的銅容器的形制及紋飾特點皆與之相近，但這是否意味著近日學者指稱的由長江流域進口而來，本研究以為證據不足。何況三星堆出土了至少 24 件的銅容器，比長江流域所出土在量上不見得少，而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青銅人像神像，更呈現了三星堆鑄品的藝匠，對塊範法的掌握，如此大的青銅器使用中心，對熟悉的技法缺乏鑄造容器能力，而必須仰賴進口嗎？而尊上的虎與人體裁，雖見於安徽阜南，且後者的技藝及紋飾皆更精進。三星堆的尊的稍簡及技法上的較拙，也不無可能是更早例證？總之，三星堆青銅藝術與長江流域間的流通是存在的，但方向上的複雜性是否「進口」所可概括，仍言之過早。雖三星堆的青銅容器藝術，顯然與長江流域有更直接的流通關係。至於三星堆與同時的安陽在青銅藝術方面，及青銅與其它質材相關性等兩方面，則各保持特質，互相之間相同因素較少，玉器方面在玉戈等類的相通處或許是共同承自中原的二里頭與二里岡傳統吧！三星堆與安陽這兩個大城市的青銅藝術間的關係，形成透視商後期西元前約 12 世紀間城市文明關係性質的重要角度。

四、計劃成果自評

1.研究方向

本計劃在時間及空間上，由近及遠，把三星堆青銅器放在其本土的發展？絡中，及與當代的安陽和長江流域，並與兩河流域、埃及、及希臘等青銅古文明作平行比較，三星堆青銅藝術的特質及歷史意義得以更清楚的彰顯。

2.研究方法

由於有機會目驗文物及文物的考古情境，本研究得以從三星堆城牆內的青銅器及安陽洹北城牆內的青銅器，去思考兩個城市文明中青銅器消費中心所孕育的青銅藝術作具體的比較，並遠及其它青銅古文明。同時，由於文物的具體目驗，這種比較可具體地關照到鑄造技術、成形後的視覺形象、以及用銅概念等的有機組合，以避免作浮泛的比較。

五、主要參考文獻

- [1] Bagley, Robert.ed. , *Ancient Sichuan :treasures from a lost civilizati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2001.
- [2] Loewe, Michael and Schafer, Edward H. *Ancient China*, Amsterdam : Time-Life Books, 1999.
- [3] 段渝，〈商代中國黃金制品的南北系統〉，《殷商文明暨紀念三星堆遺址發現 70 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2000:17 卷 2 期，四川省社會學院歷史研究所。
- [4] 陳丹、劉家勝，〈論三星堆文化與？教〉，《殷商文明暨紀念三星堆遺址發現 70 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2000:17 卷 3 期，四川省社會學院歷史研究所。
- [5]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四川省廣漢縣文化局，〈廣漢三星

堆遺址一號祭祀坑簡報》，《文物》1987:10，頁 1-15。

[6]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 四川省博物館 廣漢縣文化館，〈廣漢三星堆遺址〉，《考古學報》1987:2，頁 227-253。

[7]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四川省廣漢縣文化局，〈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簡報〉，《文物》1989:5，頁 1-20。

[8] 李伯謙，〈從對三星堆青銅器年代的不同認識談到如何正確理解和運用“文化滯後”理論〉，《四川考古論文集》，1996，頁 64-69。

[9] 楊建芳，〈早期蜀國玉雕初探---商代方國玉器研究之一〉，《三星堆與巴蜀文化》，1993，頁 160-169。

[10] 羅伯特·W·貝格勒 雷雨、羅亞平譯，〈四川商城〉，《三星堆與巴蜀文化》，1993，頁 61-68。

[11] 李伯謙，〈從對三星堆青銅器年代的不同認識談到如何正確理解和運用“文化滯後”理論〉，《四川考古論文集》，1996，頁 64-69。

[12] 李學勤，〈三星堆饕餮紋的分析〉，《三星堆與巴蜀文化》，1993，頁 76-80。

[13] Robert W. Bagley. *Chnagjiang Bronzes and Shang Archaeology*, 《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中國藝術文物討論會》，台北故宮 1992，頁 209-256。

[14] 林巴奈夫，楊凌譯，〈中國古代的日暈與神話圖像〉，《三星堆與巴蜀文化》，1993，頁 116-135。

[15] 四川大學博物館，中國古代銅鼓研究學會編，《南方民族考古》，1990 第三輯，四川科學技術出版。

[16]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四川考古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17] 稻田耕一郎等，《三星堆：中國 5000 之謎，驚異的反面王國》，東京：朝日新聞社，1998。

[18]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19]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金沙淘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20] 孫華，《四川盆地的青銅時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